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七十八）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二三五期 ——  
（二〇〇〇年十月十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z k 0 0 1 0 d）

【史海钩沉】“文化大革命”中的歌曲（二）	何 蜀
“语录歌”风行始末	霍长和
【峥嵘岁月】彻底转变——“九一三”事件	徐友渔
文革”启发我研究延安整风	高 华
我从“文化大革命”得到了什么	王力雄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华夏文摘》增刊资讯。

【史海钩沉】

“文化大革命”中的歌曲

· 何 蜀 ·

（续上期）

◇ 封闭时期的外国歌曲

在“文化大革命”中，外国歌曲几乎全部被批作“反动”、“黄色”、“封资修”，遭到查禁。官方传媒中外国歌曲几乎绝迹。

但是，有一首法国歌曲“一花独放”，成为例外，这就是《国际歌》。这首歌在“文革”期间广播电台天天播放，在一些群众集会上通常作为终场歌曲齐唱。到了1970年更是“大放异彩”，原来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把它当成了批判林彪集团的武器，要求全党大唱。他在南巡列车上还亲自同护士、服务员一起唱这首歌，并且唱一句讲解一句。此事传达出去后，唱《国际歌》便成了一顶严肃的政治活动。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五人除毛泽东一人外全部赞同设国家主席，全会上绝大多数中央委员拥护林彪的报告，但毛泽东以“救世主”自居，坚持“唯我英明”的个人独断，毫无道理地推翻集体意见，将“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定为“反革命纲领”，迫使广大中央委员纷纷检讨“上当受骗”。另一方面，

毛泽东却又要大家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求人们通过唱《国际歌》来批判“陈伯达一类骗子”宣传的“天才论”、“英雄史观”……这大概要算毛泽东在“文革”中最难以自圆其说，最自相矛盾的举动之一了。

唱外国歌曲当时几乎等同于“资产阶级思想”，甚至会被看成“反革命”行为。但是，异国情调的歌曲总是对歌曲爱好者们有着特别的吸引力的。“你有政策，我有对策”。群众总有办法找到逃出禁锢的“缺口”。

当时与中国关系说得上亲密的只有一个阿尔巴尼亚。于是，随着阿尔巴尼亚访华文艺团体的演出增加，一些阿尔巴尼亚歌曲便得到流传。除去那首阿尔巴尼亚人作曲的“毛主席语录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广为传唱外，当时流传的还有《北京一地拉那》、《一手拿镐，一手拿枪》、《越南，阿尔巴尼亚支持你》等。老出版家、翻译家陈原在《知己能吃么？》一文中提到那首《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歌时，动情地回忆说：“直到今天我还是很喜欢那首由那时的‘知己’作曲家谱的小曲。‘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那首歌真情，朴素，优雅……在那动乱的十年间，这首充满激情的短歌（难道那时还有别的动情的歌么？）伴我度过多少个迷惘的黄昏啊！”（24）有的音乐学院学生，为了满足自己的作曲、演唱欲望，便巧妙地以“阿尔巴尼亚歌曲”为掩护，谱写一些外国味的歌曲来传唱。不过这种伪作很少得以流传。

“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少许外国电影开始上映。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和d》，朝鲜电影《卖花姑娘》、《轧钢工人》等影片上映后，片中的歌曲也随之流行。在“文革”中上映的苏联电影只有斯大林时代拍摄的两部：《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其中没有作为插曲的歌曲，否则也会随电影上映而流行（老鬼在《血色黄昏》一书中把内蒙知青唱的苏联歌曲“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误记为《列宁在十月》中的歌曲，其实此歌是50年代初期上演的苏联话剧《保尔·柯察金》中的歌曲）。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革”中期，1970年间，还流行过一首词曲作者身份十分特殊的外国歌曲，即由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创作的《怀念中国》（一译《怀念你，中国》）。

1970年3月，在西哈努克出访期间，柬埔寨国内发生军事政变，西哈努克应中国政府邀请来到北京居留并领导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直到1975年柬埔寨首都金边获得解放后，西哈努克等人才回到自己的国家（但很快就遭到“红色高棉”背信弃义的监禁）。在居留北京期间，尽管当时中国政府面临“文革”带来的大动乱，但对西哈努克等人仍竭尽可能地照顾得十分周到。在此期间，自然是通过有关部门的批准，中国大陆流行开了《怀念中国》这首歌曲。歌词大意是：“啊，亲爱的中国啊，我的心没有变，我永远把您怀念。啊，亲爱的中国……”

据西哈努克回忆，这首歌是“文革”前夕的1965年他访问中国期间，周恩来、陈毅等陪同他乘船游览长江三峡时，他被两岸美景所陶醉而写下的。他说：“这是我献给中国人民的三首歌曲之一。周恩来对这首歌似乎情有独钟。1973年，我在对柬埔寨解放区进行视察返回北京之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专为我举行了一个有600人参加的大型宴会。席间，中国的军乐团便奏起了我的这首《怀念你，中国》，曲调轻快流畅。一听到这首曲子，周恩来便停了进餐，居然随着乐队哼起歌来。”（25）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中外抒情歌曲大多已遭到严厉批判，被打成“软绵绵、轻飘飘”的“资产阶级靡靡之音”的“文革”期间，这首歌怎么会“情有独钟”地获准公开流行？与这一矛盾现象相映成趣的有另一件事：正当中共大批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被打成“走资派”、“叛徒”、“特务”，中共第二号领袖人物刘少奇已被宣布永远开除出党的时候，1970年5月，毛泽东竟向自称是“不懂共产主义”、“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亲王”西哈努克提出：“你有资格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从现在起，请考虑做一个共产党人吧。”〔26〕对号称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共产党进行这样的“吐故纳新”，实在是令常人难于理解的。

当时在群众中，受批判的外国歌曲依然在悄悄流行。特别是在知识青年下乡后，知青们更是公开地唱起了曾被他们自己批判和唾弃过的外国歌曲。

#### ◇ 离经叛道的知青歌曲

“知识青年”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的一个专有名词，特指被下放到农村去的城市学生青年，它并非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早在“文革”前，1955年至1965年十年间，就已经有上百万知识青年被下放到农村。但是“知青歌曲”却是“文革”的产物。

严格说来，所谓“知青歌曲”，只是由“文革”中、后期被下放到农村的知识青年创作的歌曲。“文革”前的知识青年大多是因“家庭出身不好”，在日益严厉的“阶级路线”桎梏下，他们升学无门，就业无路，只得到农村去另谋出路。他们从在城市被压制、被歧视的处境变成“新式农民”，没有太强烈的失落感；他们所受的“文革”前的正统教育及自身家庭社会地位的限制，多不敢乱说乱动；再加上那时毛泽东对知青到农村去强调的还不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他们还充满对美好前途的希望。因此在他们中没有出现过后来的这种“知青歌曲”。

1968年底，毛泽东的一段“最高指示”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劳动改造的运动。这一运动使得曾在“文革”中一度被称为“革命小将”，充满狂热的革命幻想的中学红卫兵们，骤然跌落到社会底层，沦落于苦难的深渊。对他们在社会地位上这种强烈的反差，曾在“文革”初期挨过红卫兵揪斗的杨绛先生有一段生动的记叙：“……上山下乡后的红卫兵，我在干校时见到两个。他们住一间破屋，每日拣些柴草，煮些白薯南瓜之类当饭吃，没有工作，也没人管，也没有一本书，不知长年累月是怎么过的。我做‘过街老鼠’的日子，他们如饿狼一般，多可怕啊。曾几何时，他们不仅脱去了狼皮，连身上的羊毛也在严冬季节给剃光了。”〔27〕

在饱尝了人世的辛酸之后。这些当年豪情满怀的“旧世界的批判者”们，曾在“破四旧”中怒斥一切轻歌曼舞，将所有抒情歌曲不分青红皂白统统贬为“靡靡之音”、“封资修黑货”，此时面对残酷的现实和毫无出路的前景，走向了对当初“造反”的反叛，创作了许多与“文革”主旋律背道而驰、离经叛道的知青歌曲。这些歌曲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哀叹知青生活的苦难，一类是对社会现实的戏谑、嘲讽。

在当时严酷的文化专制和思想禁锢下，这样的知青歌曲自然不可能发表或演出，多在知青中靠传唱或手抄本半公开流传。再加上地域和农村交通、通讯条件的限制，各地知青往往只限于传唱各自不同的歌曲，因此没有出现像当初一些造反派歌曲那样流行全国、造成广泛影响的知青歌曲。有些地方，因知青歌曲中公开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还有的是以受批判的解放前歌曲（如《秋水伊人》）重新填词而成，因而被当作“反动歌曲”或“黄色歌曲”加以追查、批判，甚至定为“反革命案件”。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一首曾引起轩然大波的《南京知青之歌》。

《南京知青之歌》原名《我的家乡》，由在江苏省江浦县插队落户的南京市66届高中毕业生任毅在1969年夏收之际创作。他以“文革”前一批自愿去了新疆的校友创作的《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为基础，改编了音乐，重写了歌词。歌词第一段是回忆南京古城：“雄伟的钟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第二段抒发人生转折的感慨：“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第三段叙述“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的知青生活。尽管歌中也有“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绣红了宇宙”这样的“文革”豪言壮语，但通篇弥漫着的是沉重的失落感和幻灭感。在流传过程中，歌词又增加了有关爱情和友情的段落。

这首歌很快由南京传入上海，又由上海知青带到了黑龙江。两年后，随着一些知青的入伍当兵，这首歌还流传到南京、石家庄等地的一些军营，只是歌名改成了《可爱的南京》等。不知经过什么渠道，这首歌甚至传到了苏联。

1969年8月，任毅的一个因残疾而留城的同学，在安装半导体收音机进行调试时无意中听到了莫斯科广播电台在播放任毅的这首歌。他赶紧告诉了任毅。任毅在第二天同一时间到他那里，果然收听到了由莫斯科广播电台播送的这首歌，苏方将它处理成男声小合唱，改名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当时“美帝”、“苏修”是中国“革命人民”的两大凶恶敌人，歌曲在“苏修”电台播放，是可怕的大罪。任毅最初打算以自首来减轻“罪行”，但有关单位尚未引起重视，不予受理。直到1970年2月，江青、姚文元作了批示，张春桥下令设立专案，任毅才被逮捕。就为这一首歌，任毅被判死刑（又一个史无前例），后经省委负责人开恩，改判十年徒刑，坐了九年监狱。在关押期间，任毅还曾三次被拉到“公判大会”上去“陪杀场”（犯人谁也不知道将宣布死刑的名单上有没有自己，每一次都是残酷的精神折磨）。

#### ◇ 百花凋零之后的“战地新歌”

在“文革”中、后期，喧嚣一时的造反派歌曲已经连同造反派组织一起退出历史舞台，“毛主席语录歌”也因大量是由李劫夫所作而随同他一起被打入了“冷宫”，领袖崇拜歌曲也只剩下歌颂毛泽东一人的了。倍感寂寞的歌坛，开始出现了经官方认可的少数新的创作歌曲。

1972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一本歌曲集《战地新歌》，书名出自毛泽东的诗句“战地黄花分外香”，以示这些诞生于“文革”战斗中的新歌比以往的旧歌更“香”。这是“文革”时期官方正式出版的第一本歌曲集，其不同寻常之处，在于选编者是“国务院文化组革命歌曲征集小组”，而选编与出版此书，则是为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这自然成了当时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此后形成惯例，每年都出版一本《战地新歌》，从1973年的“续集”一直到1976年的“第五集”。这些歌曲集都按照同一编辑体例：歌颂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歌曲打头，然后分别是反映工业、农业、解放军和其他（文教、卫生、体育等）领域的，最后是有关国际形势的。这些歌曲与“文革”前的许多创作歌曲一样，密切配合政治形势而作。大多鼓噪一阵后就被人们遗忘，很少能够流传，只有极个别的才在一些人头脑里留下特殊印象。

1970年5月21日，首都各界群众50万人隆重集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由林彪宣读了毛泽东于20日发表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后称《五二〇声明》）。声明指出：“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声明强调了“新的世界大战的

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

按照《五二〇声明》的精神，中央乐团“集体”创作了歌曲《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教唱。歌词为：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美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

当时广大群众对“战斗歌曲”已经厌倦，只有能表达个人情绪的抒情歌曲尚能流行。而这一首充满火药味的政治歌曲又为何能广泛流行呢？除去其歌词通俗、曲调明快之外，还因其内容不涉及“文革”的险恶政治——在“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中，就再没有什么配合形势的政治歌曲流行过。

这首歌是1972年出版的《战地新歌》中最后一首。当时流传甚广，特别是“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一句，被许多人当作了斗嘴时的流行语，以至在近年的某些相声、电视剧中也被用了进去。但是许多人却忘了产生这首歌的特殊背景。作家权延赤在《微行——杨成武在1967》一书中，错将此歌写成是在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期间“百万雄师”为抗议谢富治和王力发表支持工总司一派的讲话而唱过的歌。将此歌的出现提前了三年。28而在柬埔寨问题专家王爱飞所写《西哈努克与中国》中，又将此歌错记成是在柬埔寨政变刚发生，西哈努克尚未来到中国的时候，就被“周恩来突然想起了”的“正流行于全国的一首歌”。（29）

这是“文革”中期“领导新潮流”的一首“战斗歌曲”。在1972年以后每年照例编选、出版一本的《战地新歌》，每一集的最后都选有一两首这类题材的歌曲。如《续集》的最后一首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第三集》的最后一首是《全世界人民团结战斗》，《第四集》的最后两首是《天下大乱，形势大好》、《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第五集》的最后两首是《第三世界团结战斗》、《高举反帝反霸大旗前进》。这些歌中都充满了欢呼、颂扬动乱的套话，如“天下大乱，形势大好，全世界人民团结战斗”、“正义的枪声，激荡在五洲”、“战鼓敲，风雷吼，革命烈火燃遍五洲”等等。但这些歌已经基本上没有人唱了。

“文革”政治歌曲的“压卷之作”，给人们留下最后印象的一首，大概要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了。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广播，群众演唱会上经常高唱，“就是好！就是好！”的狂热歌声响彻大陆，使许多人难以忘却，至今有不少文章提到它，但大多将其错记为“文革”后期江青一伙为“批邓”而组织炮制的。其实，这首歌曲出现在“文革”中期“批林批孔运动”中，被收入1974年出版的《战地新歌》第三集，词曲作者署名为“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文艺学习班”，并不是为“批邓”，而是为批判林彪创作的。因为毛泽东认为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主持批判林彪的极左批到了“文革”头上，便将其扭转为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于是，“文化大革命”的副统帅林彪被说成是“仇恨和破坏文化大革命”，“妄想复辟资本主义”，因此要高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来对其进行反击。只是这首歌没有直接点林彪的名（这也是造成一些人记忆错误的一个原因）。在同一集《战地新歌》中另有一首儿童歌曲《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则说得更明确：“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决b里藏诡计。鼓吹‘克己复礼’，一心想复辟。呸！红小兵，齐上阵，大家都来狠狠批！……”

在那些所谓“战地新歌”中，能在群众中流行的实际上只是一些曲调优美的抒情歌曲。如那首蒙古族民歌风格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还有《草原上的红卫兵

见到了毛主席》、《北京颂歌》、《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等。1973年，由洪源作词，田光、傅晶作曲的《北京颂歌》，经张越男演唱而传遍全国。其影响竟持续到“文革”结束20多年之后。在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中，一群留美学生在怀念祖国和亲人时一起唱起了这首歌。电视剧播出后，有不少在国外的人写信给张越男，述说特别特别想家、想北京的心情。这些人自然都是当年的抒情歌曲“发烧友”。可以想象，在当年那种百花凋零，“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环境中，一首曲调优美的抒情歌曲能够给予他们多少慰藉，多少鼓舞！

# ◇ 激情与抒情——在歌曲流行趋势的背后

民间歌曲的流行趋势，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群众情绪的变化。从“文革”初期“毛主席语录歌”和各类造反派歌曲的兴起，到后来那些充满黑色幽默意味的民间“重新填词”歌曲和离经叛道的知青歌曲的出现，可以清楚地看到广大群众对“文革”从狂热到幻灭、从拥护到厌恶的心理历程。作家茅盾在大革命失败后所写的长篇小说《蚀》三部曲分别为《幻灭》、《动摇》、《追求》，而广大群众在“文革”中的心理历程则可以说是倒过来的三部曲：追求、动摇、幻灭。

在“文革”初期，官方传媒曾预言过许多美好的前景。1966年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宣称：“当前这场空前规模的文化大革命，必然预示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飞跃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飞跃。”1966年第八期《红旗》杂志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中宣称：“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我们将在全国人民中更加牢固地扎下毛泽东思想的根子，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挖掉资本主义复辟的根子。”并且针对那些“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尖刻地诅咒：“历史将无情地嘲弄你们这批蠢驴。”但是，“文革”的深入，却使广大群众发现并非是“帝、修、反”而是自己受到了嘲弄。

自1968年秋开始的“深挖五一六”运动，使许多原为“文革”运动主力的红卫兵、造反派遭到打击，一度为革命神话所蒙蔽的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逐渐看清了“皇帝的新衣”的真相，“革命激情”日益衰落。更多人陷入苦闷、彷徨，更多人开始“向内转”，抒情歌曲的走红成为历史的必然。

从激情到抒情的情绪变化在上层也得到了反映。当文艺工作者竭力与“文艺黑结”划清界限，在演出中仍像“文革”前期那样充满激情地“大喊大叫”时，周恩来提出了适应形势的忠告。1970年7月1日、3日，周恩来审查北京军区、海军、空军和总政治部宣传队表演的文艺节目时指出：清b在只提革命歌曲，不敢提革命抒情歌曲，革命激情和革命抒情是对立的统一，要有张有弛，有激有抒。你们的节目只有“革命激情”四个字，这是滥用激情。比如，大海有时汹涌澎湃，但有时也很平静。不敢使用革命抒情是一种偏向。革命友情、战斗豪情、官兵之情、军民之情为什么不能抒呢？舞台上不能使劲喊，越唱越快，越唱越尖。以后不能再搞那些标语口号似的东西，这些倾向都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极左思潮不肃清，文艺就不能发展。（30）

1973年6月10日，周恩来陪同越南领导人参观西安，根据周恩来提议，陕西省和西安市在为越南客人举行的文艺演出节目中，加入了由贺绿汀作曲的《游击队之歌》。演出之后，周恩来委托工作人员向表演该节目的演员传达他的意见：唱歌不是唱得音越强越好，节奏越快越好；《游击队之歌》唱得太快了，没有意境，过去不是这样唱的。没有革命的抒情，就没有革命的激情。（31）

周恩来谈到了“极左思潮”的影响，但他当时不可能认识到这个“极左思潮”

的根源何在。同时，他也不可能找到群众“革命激情”衰落的原因。正如他不可能认识到由伟大领袖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为何会破产的原因一样。

“文化大革命”后期，周恩来逝世之后，人民群众的大海骤然掀起了一次汹涌澎湃的激情高潮。在“四五”运动中，天安门广场的示威人群中重新响起了悲壮激越的《国际歌》声。这已经不同于“文革”初期群众集会上的《国际歌》声，更不同于“文革”中期毛泽东要求用来批判林彪集团的《国际歌》声。这是真正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群众革命激情的爆发。这歌声预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注释：

- (24) 《不是回忆录的回忆录》176页，文汇出版社1997年版
- (25) 《我所交往的世界领袖》45—4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 (26) 《我所交往的世界领袖》63页
- (27) 《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钱钟书杨绛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
- (28) 《微行——杨成武在1967》87页，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年版
- (29) 《西哈努克与中国》，《我所交往的世界领袖》180页
- (30)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 下卷》377页
- (31)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 下卷》599页

∞ ∞ ∞ ∞ ∞ ∞ ∞ ∞ ∞ ∞

“语录歌”风行始末  
• 霍长和 •

李劫夫（1913—1976）中国作曲家，文革前曾创作了《我们走在大道上》等许多传唱一时的歌曲。为“毛主席语录”谱曲时，他任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由他谱写的“语录歌”超过百首。

传唱“语录歌”，是文革开始不久的产物和一大现象。作曲家劫夫是语录歌的“始作俑者”和作品最多的人。本文用第一手材料说明“语录歌”是怎么产生和传唱的。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劫夫是“语录歌”的“始作俑者”，其最初的写作时间是1966年8月。

“始作俑”是事实，写作时间却不准确。

劫夫的歌中出现毛泽东语录，的确是在1966年，不过不是8月，而是3月。那时，他同夫人张洛及北京军区词作家洪源赴河北邢台抗震救灾，洪源写了一首歌，叫《你震你的，我干我的》，当他写到“你震你的，我干我的。灾区人民心向党，主席教导记心里”这几句词时，后面就不知道怎么写了。这时，他抬头看见了立在村里的毛主席语录牌，上面写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洪源一拍大腿，说，就是它了！于是，毛主席这段话就被写进歌的后半部份。

“文革”中，劫夫把《你震你的，我干我的》中的毛主席语录部份独立出来，在原有音调的基础上做了些改动，又以《争取胜利》名之。这首歌在“文革”中流传极广。近年，它的旋律常可在国内足球赛场上（由球迷乐队演奏）和港台电视剧中（作为背景音乐）听到。

当然，“始作俑”不是指那首少为人知的《你震你的，我干我的》，而是指1966年八九月间劫夫写的那一批“语录歌”。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发生严重地震，劫夫与夫人张洛前往抗震救灾。离开邢台，劫夫和张洛在北京逗留了一段时日。他们住在位于张自忠路的辽宁驻北京办事处。在那里，他们遇到了辽宁省委秘书长。从那人手中，他们看到了关于批判“三家村”的文件。劫夫说，看来要有一场大风暴啊！那人也说，这场风暴不简单。回到房间，劫夫和张洛说，刚吃几年好饭，又他妈瞎折腾。这就是劫夫最初对“文革”的态度。

劫夫和张洛从北京回到沈阳不久，“文化大革命”的火就在沈阳音乐学院校园里“轰轰烈烈”地燃烧起来了。

学生不再上课，党委被“砸烂”，昔日备受尊重的老教授们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还有一些普通教师和校内工作人员，也因这样那样的原因成了“牛鬼蛇神”。他们被批斗，游街，戴高帽，剃鬼头，更有甚者，学院党委书记卢肃在一次批斗会上竟被打得半死。

劫夫的处境怎样？

劫夫的处境有点奇怪——虽然院党委书记惨遭毒打，可他这个院长却被选进了领导全院运动的革命委员会；虽然他被选进了这个委员会，可揭发批判他的大字报却照贴不误；虽然有关他的大字报很多，却没有这样那样的帽子（如“修正主义分子”之类）。更令人不解的是，那些批判他的文章，在他的名字后面，总要带上“同志”、“院长”的称谓，行文中用的是“您”这样的字眼，行文的口气，也没有当时批判文章所具有的火药味，相反，它们是商量的善意的，有的甚至是亲切的。看得出来，造反派们对于劫夫，好像有点下不去手，有点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事情是明摆着的：作为作曲家，劫夫没写过一首坏作品；作为一院之长，其功绩与贡献也是有目共睹；他的作风也正派，待人也宽厚、和气。

所以，对劫夫，最初他们确实有些心慈手软。

可是进入8月份，随着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一场“大破一切剥削阶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即“破四旧”运动迅速席卷全国，沈阳音乐学院的“革命小将”也意识到再这样下去不行了。

于是，他们对劫夫的家也采取了“革命行动”：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先后把劫夫的家抄了七八次，其中有三次是在一周之内抄的。他们抄走了劫夫多年收藏的古玩和石印，它们是：由田黄、鸡血、寿山石刻制的石印三十八对；秦汉之交仿制的秦始皇喝酒用的爵；劫夫从旧物市场买来的明朝的木刻元杂剧人物和俄国银烟具；徐悲鸿的八十七神仙图的复制品；劫夫五十年代出访匈牙利带回的全部工艺品。

至于抄走的各种书籍的数目，已无法统计。家，被一抄再抄，红卫兵们还要干什么？被揪出来？戴高帽游街？劫夫在不安地等待着。

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或者说还没来得及发生，却出现了另一件事：这就是为毛泽东语录谱曲。

那么，劫夫是怎么想起要为毛泽东语录谱曲的？这些“语录歌”最初又是怎样传布开去的？有一个叫耿大权的人帮我们解开了这个谜。耿大权，男，现任辽宁《



音乐生活》杂志副主编。笔者于1998年5月19日采访了他。

耿大权从小喜欢音乐，平时没事儿，就和小伙伴们一起吹吹拉拉。二胡、小提琴、笛子、箫，他什么都鼓捣，还自己作曲。高中一年级，他写了一个小歌剧。虽说那纯属小孩子的涂鸦之作，没想到，它不仅参加了区、市二级汇演，还在市里得了奖。在那次颁奖会上，他第一次见到了劫夫。这是1964年春天的事。

这次意外的成功，使他萌生了想考音乐学院的念头。过了不久，沈阳举办劫夫作品音乐会。他听到这个消息，托同学弄了一张票。演出结束，他没有走，他想见见劫夫，他想把自己的心愿告诉劫夫。观众散尽，他来到后台，凑到劫夫面前，真的向劫夫说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写过小歌剧，您看过的，您还为我发了奖。我想考音乐学院……劫夫那天情绪很好，还同他握了握手，然后说，将来找我吧。

耿大权真的去找劫夫了。1965年，他多次拿着自己写的歌，到劫夫的办公室。劫夫总是热情地接待他、鼓励他，劫夫说，你应该学学京剧的唱腔，它的节奏很丰富……歌曲中的节奏很重要，它会把句子弄得参差不齐……这样才有动感，唱起来才有气势。劫夫还说，你要多背歌，记住了，到写的时候，它自然就会流出来；不要怕像这像那，只要统一在你的歌里就行。

见劫夫不拒人千里之外，还特别喜欢小孩，从此，耿大权往那儿跑得更勤了，并且地点由院长办公室变成了劫夫的家。他现在还记得，劫夫家的门上有个圆筒，圆筒外面有个小盖，把盖揭开，里面才是门镜。由于那一阵他去得太频，劫夫的二女儿都有点烦他了，从门镜里一看是他，就不给开门。这时，总是劫夫亲自把门打开。

耿大权的一首歌经劫夫改过，并且准备要在《音乐生活》杂志上发表。这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劫夫为语录谱曲的那几个小时

接着，就到了8月。一天，已经卷入红卫兵运动洪流中的耿大权，得到一份从北京传来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主办的《井冈山》报，看到上面登了一首歌，歌中“造反有理”四个字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想，毛主席的话可以写到歌里，为什么不能专门为完整的毛主席语录谱曲？他为自己的这个想法兴奋不已，并且当即掏出衣兜里的《毛主席语录》，在二十几段字数较少、他认为可以谱曲的语录前面画了记号。同时，还试着谱写了几首。

这是上午的事。当天中午，他给劫夫打了一个电话，他说：“劫夫老师，我有个想法，很多主席语录适合谱曲，我试着写了几首……您应该带头写。”劫夫在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然后非常兴奋地说：“这想法好，你马上过来，咱俩研究一下。”

耿大权扔下电话，火速赶到劫夫家。一进屋，耿大权就气喘吁吁地说：“您谱曲，对于宣传毛泽东思想真是太有利了。主席语录，能唱就能背下来，就能记得牢。”耿大权接着说：“您快点写出来，我去教唱。”

8月的沈阳，天气十分炎热。此时，跑了好多路说了好多话的耿大权，已是汗流浹背。劫夫说，屋里太热，咱们到外面去吧。于是，劫夫和耿大权一人拿着一把小竹椅，来到劫夫家的楼门外。此时是下午3点钟左右。

耿大权拿出自己写好的歌（约四五首），给劫夫看，说，您看行不行？劫夫仔细看了一遍。他未置可否，只是把耿大权写的这几页翻过去（耿的歌写在一个小日记本上。这日记本他至今仍保留着），然后把本子放到腿上，低头写了起来（《毛

主席语录》是耿随身带去的)。

到了7点左右，劫夫才停下笔。他一共写了17首。他让耿大权给每首歌起名，最后俩人商定，歌名就用每段语录的第一句。这17首歌包括：《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争取胜利》、《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等。

弄好了歌名，耿大权说：“明天正好要在体育场召开辽宁省红卫兵大会，我们把这些歌印成传单，组织同学去教唱。”

劫夫说：“弄好了给我看看。”他没留底稿。

耿大权拿着劫夫写好的歌，跑到一个同学家。这个同学刚好在家，耿大权说明来意，那人说，我认识东北工学院红卫兵组织头头，咱们到那里去印。

两人跑到东北工学院，找到了那人。此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耿大权把事情的经过和自己的想法说了一遍。由于事情紧急，那人想也没想，决定立即组织人刻印。子夜一点多，17首歌已刻印了一半，那人好像才回过味来，他说，这歌真是劫夫写的吗？耿大权说，你不相信，可以给劫夫家挂电话。那人真的当即挂了电话。

这下他的疑虑打消了。他高兴地说，真是劫夫，劫夫嘱咐我们要印好。

第二天清晨，耿大权背着一大捆印好的歌传单来到劫夫家，劫夫在传单上改正了几个小错误。离开劫夫家，一夜没睡却丝毫不觉疲倦的耿大权，又急忙赶回自己的学校。

当天的晚些时候，耿大权在本校同学的帮助下，将这批印有“语录歌”的传单拿到沈阳市人民体育场，散发到聚集在那里的数万红卫兵手中。此后，他又与几个喜欢音乐的同学——何钦成（现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孙宝志（现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封维奇（现浙江省政府卫生所大夫）等人，到沈阳的环路无轨电车上边散发传单，边教唱这些歌。

他们整整教了一周。

从此，劫夫的这些“语录歌”很快在沈阳及辽宁各地传唱开来。

不久，发生了一件劫夫和耿大权没有想到的事。1966年9月3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分别用一个整版刊登了10首“语录歌”，而且，两报均同时配发了“编者按”。10首当中，劫夫的占了8首，即《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的教育方针》、《分清敌友》、《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争取胜利》、《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工作就是斗争》，另外两首是中央乐团集体创作的。

据朱悦鹏《关于刊登劫夫为毛主席语录谱曲的情况》（1967年1月23日，现藏沈阳音乐学院档案室）一文的说明，是这样的：“1966年八九月间，人民日报曹宪文去东北组稿，在沈阳发现劫夫为毛主席语录谱写了几十首曲子，有的已经在沈阳红卫兵中传唱。曹即把劫夫谱的毛主席语录歌寄回到报社。文艺部李希凡看到曲子后问我，是否可以刊登。我和文艺部研究后认为，把毛主席语录谱成曲子广为传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好形式，是一种创造，建议发表。发表前，我要文艺部的同志问问劫夫的情况，问他有什么问题，能不能用他的名字发表。后来，文艺部的同志告诉我，劫夫没有什么重大问题，可以用他的名义发表。于是我

们写好‘编者按’，把选好的语录歌曲拼好版，送唐平铸审阅，唐修改了‘编者按’后，批准发表。”

不日，全国各地的报纸也分别以同样方式转载、刊发了这批“语录歌”。于是，产生于沈阳的“语录歌”，迅速风靡全国。

一时间，劫夫变成了大忙人。

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成群结队地来找他，有的甚至住到他家。据张洛介绍，最多的时候，家里一天竟来过五十多个红卫兵。他们只有一个目的：让劫夫为他们选出的毛主席语录写歌。

许多从“文革”中走过来的沈阳音乐学院人，至今还记得这样的情形：在学校主楼门前，经常聚着一些操不同口音的男女红卫兵。他们总是由一两个领头的出面，将手里的小本送到坐在台阶旁的劫夫手里。劫夫也总是拿个铅笔头，当场就写，写完就交给他们。

当时，请劫夫写“语录歌”的，不仅有红卫兵，还有国内各地的报社、杂志社。1966年12月11日的《光明日报》有个“编者按”中写道：“为了帮助大家学习毛主席关于破私立公的伟大思想和教导，我们选了一部份有关的语录，请劫夫同志谱了曲，供大家学习和传唱。”

可见，《光明日报》是请劫夫写过“语录歌”的。劫夫档案保留的一封他的亲笔信证实，《解放军歌曲》编辑部也请过他。

就这样，应人之约，加上自己也主动写一些，以后的一两年内，劫夫写作了大量“语录歌”。那两年，许多作曲家都写过“语录歌”，但数劫夫写得最多、影响最大。据统计，这一两年间，劫夫谱写的“语录歌”已超过百首。

□ 原载《南方周末》

~~~~~

【峥嵘岁月】 彻底转变——“九一三”事件  
• 徐友渔 •

1971年9月，我从乡下回到成都。这月下旬，听说各单位传达了一个通知，国庆节将不在天安门广场集会，也不举行游行庆祝活动。这是相当异乎寻常的事情，因为自1949年以来，每年都要举行这种活动。特别是“文革”期间，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即使不在国庆节，也经常在天安门城楼检阅50万群众的游行，一些敏感的人猜测，可能中央出了大事。

国庆之后我回到乡下，一天下午，一个同学急匆匆地来到我那里，告诉我，林彪图谋政变未遂，乘飞机企图外逃，在飞往苏联的途中座机被击落，坠毁于蒙古，现在北京正在大力清查林的余党。我听了惊得目瞪口呆，忙问消息是否属实。这时又来了更多的知青，纷纷证实这一消息。大多数人是从外台广播知道的，个别人在成都就听到了传闻，还有人是直接得之于官方渠道。一下子，大家无心干活了，坐下来长时间议论这件事。知青们对此除了感到惊异之外，还明显地带着幸灾乐祸的情绪。显然，这对“左派”来说是一件大丢面子的丑事。他们很难向全国人民，向全世界作出解释。

知青往往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有人指着公社办公室里挂的林彪画像说：“这人早就完蛋了，该把他的像取下来！”有人劝告小学教师，不要再带领学生念诵“林

副主席指示”，祝愿“林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他们的言论把当地干部和教师吓得魂飞魄散，有的人还受到公安机关追查。幸好正式文件很快就传达下来，听宣读文件时，整个会场肃穆得出奇。听说，在县以上干部听传达时，有人惊吓得如五雷轰顶，有人气急败坏，如丧考妣，还有人当场昏倒在地。

人们预想的难堪局面并未出现，党中央发布了一个又一个文件，公布了一批又一批材料，揭发林彪及其同党的罪行。文件指控林彪是钻进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连他善于打仗这一点也被否定。如果听信这些指控，自然会认为林彪从来就不是好东西。但人们仍然会问，他怎么当上了“最亲密战友”，登上了“副统帅”的位置？我和我的朋友们，我想还有全国人民，都在等待着解释。如果没有很好的解释——当然不可能有——显而易见，惟一的办法是承认错误，承认让他当上第二号人物是错误的。

林彪作为毛泽东惟一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地位，是写入了党章的，他是中共九大选出来的。如果他是靠密谋登上高位，那么可以揭发他、批判他了事。但他自从50年代就是党的副主席，在“文革”中，中央文件、党的报刊一直称颂他“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现在怎么会图谋政变，怎么会投敌叛国呢？当初为什么要选他？毛泽东为什么要让他当自己的接班人？把这样一个英雄强加于全国人民，现在他出事了，难道可以不交代，难道可以只说一句“他早就是坏蛋”？党的法定接班人为什么会仓皇出逃，并葬身荒漠？六个政治局委员怎么一下子成了“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党的内部在搞什么名堂，是怎么回事？党不是被称颂为“光荣、伟大、正确的党”吗？这样一些问题，长时间在我心中撞击。

后面还有出人意料的好戏。中央发了一个文件，转载了一封据说是毛泽东于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信，信中似乎表示他不大同意林彪对他搞个人崇拜。这封信的内容现在被解释为毛泽东早就知道林彪心术不正。

本来，毛泽东被塑造为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明察秋毫、洞察一切的万能之神。但他培养、指定的接班人却要暗杀他，是个野心家，投敌叛国的反革命，这已成了天大的笑话。现在当局拿出材料证明，毛泽东早在发动“文革”时就看透了这个坏蛋，看来毛泽东并未犯错误，他依旧料事如神。

我听传达这个文件时，已经调回成都当工人。许多人被这封信弄糊涂了，简直未料到还可以这样来解释。据说这封信是毛泽东写给江青的，林彪事件是一个关乎全党全军全国的政治事件，毛、江夫妻之间的私房话怎么能证明毛泽东不但没有责任，而且还是先知先觉？而且，信上只说毛泽东不太乐意过份吹捧他，并没有正式地在政治上否定林彪；其次，如果听任官方的解释，毛泽东暂时让林彪吹捧自己是为了打倒刘少奇，那么这不是明显地在玩权术、搞阴谋吗？这难道是一个“伟大领袖”的作为，他不是发出过“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号召吗？总之，官方的解释矛盾百出，不论你听信哪一方面，都会在另一方面露出破绽。

一个无法回避的、全国人民都明白的问题是，为什么没有人认错？为什么毛泽东本人不认错？既然企图以一贯的手法愚弄人，人们就只能得出自己的结论。许多人在政治上不那么信任领导人了，也不再认为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了。

我充份了解林彪事件在破除我们这一代人的政治迷信方面起了多大作用。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们疏离“文革”中官方政治教义的过程早在运动中期就已经开始。怀疑不断地增加，否定不断地产生，林彪事件使许多人完成了这一离经叛道的过程。

由于毛泽东采取发动群众，运用“四大”的方式来搞运动，党内的矛盾和阴暗

面在老百姓面前得到相当程度的暴露，人们知道了许许多多他们以前无法想象的事。

有人在大字报中“揭发”，领导干部们并不都是如他们自我标榜的那样是人民的公仆，而是享受着惊人的特权，有的过着奢侈的，甚至是糜烂的生活。比如，大字报揭发四川的某负责人，一人就占有四栋楼房，每次在温水游泳池中游泳，就得耗去数吨煤。他和其他高官跳舞、看戏、游泳，都要抽调歌舞团貌美个高的女演员作陪。他们的高干病房简直是疗养的天堂，那些漂亮的护士往往成了他们发泄淫欲的对象。他们可以用外汇购买国外高档消费品，在国内也有只对他们开放的特供商店，他们的子女从幼儿园起就享受特殊照顾和教育。这些揭发大多出自他们的下属、秘书、警卫，就算只有一部份真实，也足以使人猛省。

“文革”前，各级领导在实际生活上树立了一大批模范人物，作家在小说、电影、戏剧中塑造了各种英雄形像，他们都被用来教育青少年，使他们形成革命的人生观。但“文革”把这一切都打得粉碎，把许多模范说成是假典型。比如，四川有个农妇叫冷月英，据说曾被大地主刘文彩长期关在水牢中，她的事迹流传全国，她到处作报告，控诉旧社会，歌颂救命恩人共产党和毛主席。但“文革”中有人“揭发”，她根本就没有关过水牢，她讲的故事是编造的。“文革”前出版的小说《红岩》是一部脍炙人口的作品，书中描写了共产党员被捕后在国民党的监狱中进行坚贞不屈的斗争。但“文革”一爆发，小说作者罗广斌就被宣布为“叛徒”，他跳楼自杀身亡。书中的革命英雄也被说成要么是叛徒，要么是纯属子虚乌有。一大批对青年学生有影响的小说，如《青春之歌》、《三家巷》，被宣布为大毒草，书中主人公的高大革命形像被彻底否定。

“文革”运动一波三折，翻来覆去“，一个干部，一会儿是黑帮，一会儿是革命者；一项政策，一会儿是党的英明决定，一会儿又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弄得人们莫衷一是，使得党的权威丧失殆尽。政治上的不择手段和实用主义，使人不可能维护真诚的信念。我在运动中听说总部头头C讲，在聂元梓的办公桌里，同样放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材料，一种说中央某个有争议的人物是黑帮分子、野心家、阴谋家，应坚决打倒；另一种说他是真正的革命者，是毛主席的人。她可以根据形势抛出不同的材料，以捞取政治好处。当然，引起人们窃窃议论的还有毛泽东本人。比如，陈伯达给他当了几十年秘书，1958年的庐山会议后替他写文章大肆批判彭德怀，“文革”中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专门阐发他的“文革”理论。但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陈站在林彪一边，毛泽东马上宣称他和陈共事30多年，两人从未很好地合作过。在次年1月底，中央又发出大量材料，说陈是叛徒、老牌反共分子。人们不禁要问，那么为什么要用陈伯达这样的人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呢？他以前撰写了那么多文章批判彭德怀，批判毛泽东的其他政敌，还算不算数呢？

党中央的专案组指控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还指控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我于1969年在学校听到传达关于他们的“罪行审查报告”时，就感到其证据根本不说明问题。即使其他人不善于怀疑，相信所公布的“罪证”，他们也会问，叛徒、内奸、工贼是怎么当上了党的副主席和国家主席的呢？一个党和政府，如果它的大多数重要领导人都是“坏蛋”，它怎么可能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呢？

有趣的是，相当多的红卫兵和老百姓对于“文革”产生怀疑和抵触，是从了解到江青的历史和个人生活开始的。江青当过演员，嫁过若干个丈夫，曾经有过十分浪漫和风流的经历。在“文革”中，从失势的高官到普通老百姓，都爱议论江青这段“不光彩”的历史，这种人身攻击是对“文革”不满的表现。这里有可悲的一面，按照中国封建文化传统，一个当过“戏子”，嫁过许多丈夫的人是不吉之物，是

“祸水”。而中国封建王朝的文官武将们不敢指斥“昏君”，却大肆抱怨和批评“妖后”害君误国。在这种意义上，对江青的个人攻击是不足论的。但另一方面，既然江青把与她经历相似的一大批人当成十恶不赦的坏蛋打翻在地，那么人们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她的过去，就是合理的。她把30年代在上海文艺界与她共事的人全打成黑帮，又怎么能期望人们对她有好印象呢？

当然，对于红卫兵这一代而言，改变政治信念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文革”初期，为了煽动他们起来“造走资派的反”，把他们封为“革命小将”、“革命先锋”，请他们到北京，上天安门城楼。而到了运动后期，不是指责他们犯了错误，就是把他们打成反革命，中学生则统统赶下乡去。卑贱的生活，中国农村极度贫穷落后的现实，犹如给心灵中不满的火种煽风、浇油。与我同龄的这一代人，其中大多数都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我的生活给毁了。”当然，其中少数人在“四人帮”垮台之后通过高考等途径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但这种人既然能够在艰苦无望的条件下坚持自学和奋斗，他们就更不会淡忘那恶梦般的岁月。

对于我来说，抛弃和否定“文革”中形成的政治观念，是一个更为缓慢的过程。因为我坚持以下两点，一、现象往往不能说明本质；二、判断历史性的是非功过，要尽可能把自己的切身利益撇开。“文革”造成的破坏和动乱，红卫兵被玩弄的下场和下乡的艰苦生活，当然促使我怀疑和思考，但它们不是使我改变的根本原因。

在“文革”前，中国的青少年普遍相信这样一套政治神话，即中国大陆是世界上最自由、平等、富裕、强大的国度，世界上其他国家（也许除了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的人民都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我们的责任是解救他们。当然，我们有一支举世无双的军队，但我们最热爱和平，不想靠武力输出革命，等等。

但在乡下，当我们用锄头打土，用扁担挑谷的时候，人们从空中电波中得知阿波罗号飞船已经使美国宇航员登上了月球。中华民族对月亮有特殊的感情，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在中国人民中间世代相传。当人类将这一瑰丽的梦想变成现实时，我们正在乡下过着断粮缺柴的日子。是谁代表人类实现这一伟大梦想的？竟然是那最凶恶的敌人，最反动、最腐朽的“美帝国主义”！

在1970年初，我偶尔翻到一张内部发行的《参考消息》，上面登载一则消息说，日本上一年的钢产量大约是一亿吨，我看了大吃一惊。日本的国土是中国的几十分之一，我们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是怎么回事？我的思想的改变和政治神话的破灭同步进行，现实生活中每一件残酷的事、荒唐的事，对党史和中国近代史上每一件事实的重新认识和评价，都在瓦解那个神话。对我而言，可能也是对我们这一代的大多数人而言，林彪事件是发生在眼前最荒唐、最可笑的事件，它为人们怀疑、探索和否定“文革”作出了结论。

∞ ∞ ∞ ∞ ∞ ∞ ∞ ∞ ∞ ∞ ∞

“文革”启发我研究延安整风

• 高 华 •

【本文节选自《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一书后记，标题为编者所加。——编注】

这本书从酝酿到写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80年代初，我产生了写这本书的念头，但促使我对延安整风这一事件萌发兴趣则是在更久远的年代。

我第一次接触到“延安整风”这个词是在文革爆发前夕的1966年春。记得

有一位前辈学者曾说过，旧中国黑暗的现实，使中国的青少年比欧美国家的青少年，在政治上更趋于早熟。我想说的是不仅在旧中国情况如此，在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情况亦是这样。新中国层出不穷的政治斗争及其对社会的广泛影响，使我不幸地过早地关注起自己不应该去关心的事情。

我读书启蒙的年代是六十年代的南京，那是一个政治意识畸形发展的年代。从1963年初开始，我对母亲订阅的《参考消息》发生了兴趣，经常躲着她偷偷阅读。我也从那时起，养成了每天读江苏省党报《新华日报》的习惯。可是我对那时的社会状况并不清楚——应该说，除了雷锋、革命先烈、越南、红军长征的故事，那时我的头脑中并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但是到了1963年下半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我愈来愈注意《参考消息》和报纸上刊载的有关中苏两党论战的报导。1964年春夏之间，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在苏共二月全会上作的“反华报告”，第一次看到对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这对于我是一个极大的震动（这份报告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以后我长期保留这份《人民日报》）。我开始思考苏斯洛夫报告中所论及的一些词汇：毛泽东是“左倾冒险主义”、“半托洛茨基主义”、“唯意志论”等等（七十年代，我从内部读物才知道，苏斯洛夫是一个顽固的教条主义者。近年出版的俄罗斯资料透露，1964年苏共党内的革新势力利用与中共的论战，削弱了斯大林主义者在苏联的阵地，一度遏止了保守势力复辟的势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保守的苏斯洛夫才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作了这个报告）。对于这些话，当时我似懂非懂。我联想自己的日常生活，几年前那些饥饿的日子，我随母亲去南京郊外的劳改农场去探望因“右派”问题而被下放劳动的父亲，1963年夏，我已被南京市外语学校录取，却因政审不通过而被拒之门外——我对当时的政策居然产生了一些疑惑。不久甚至连小学也讲起“阶级路线”，我因出身问题越来越感到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迎来了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学校的号召下，我通读了《毛选》1至4卷，我多次阅读了收入《毛选》中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毛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于是我知道了“整风运动”这个词。

紧接着文革爆发，我从每天读的《新华日报》上发现，1966年5月初北京召开的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群众大会上不见了彭真的名字，接下来我就读小学的一些干部子弟（我的小学邻近南京军区后勤部家属大院和《新华日报》社家属区），手拎红白相间的的体操棒在操场上殴打一位“成份不好”的30多岁的余姓美术教师，校长兼支部书记则装着什么也没看见。

南京1966年8月下旬的红色恐怖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我的家庭受到冲击，有一天，我无意中听父母的谈话，父亲说，这一次可能躲不过去了，再不跑，可能会被活活打死。父亲终于离家出逃，躲在山东农村老家那些纯朴的乡亲中避难，不久，我家附近到处贴满了父亲单位捉拿他的“通缉令”。

在文革的血雨腥风中，我看到了多少景象！曾几何时，那些在文革初期指挥揪斗“死老虎”的当权派自己很快也被拉下了马，“周扬四条汉子”、“彭罗陆杨”、“刘邓陶”像走马灯似地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真是“一顶顶皇冠落地”！从那时起，我就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报纸上的“排名学”。1967年初，在南京大学的教学楼上，我亲眼看见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被批斗，就在半年前，我的小学的校长还是满口“江政委”唤个不停。不久我又去了省委办公大楼，那里正举办所谓“修正主义老爷腐朽生活”的展览，那宽大的带卫生间和休息室的书记办公室，那嵌在舞厅天花板壁槽内的柔和灯光，以及用从缅甸进口的柚木制成的地板，无一不使我头脑翻江倒海。

我的家庭背景使我不能参加这场革命，我在家庭中受的教育以及我从各种书籍中所获得的精神营养也使我不会去欣赏那些在革命名义下所干的种种凌虐人的暴行

。在文革前，我家有一个区文化馆图书室的借书证，因此我读过不少中外文学，历史读物。至今我还记得，在恐怖的1966年8月，我如何从母亲的手中夺下她正准备烧掉的那套杨绛翻译的勒萨日著的《吉尔·布拉斯》等十几本书籍。在焚书烈火中被抢救下来的《吉尔·布拉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普希金诗选、《唐诗三百首》等给了我多少温暖，让我在黑暗的隧道中看到远处一簇光！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希望之光是黯淡和飘忽的。1967年初，我在家附近的长江路南北货商店墙上看到一张“特大喜讯”的大字报，上面赫然写着叶剑英元帅最近的一次讲话，他说，我们伟大领袖身体非常健康，医生说，毛主席可以活到150岁。看到这张大字报，我头脑轰地一响，虽然有所怀疑，但当时的直觉是，这一下，我这一辈子都注定要生活在毛泽东的时代了。我马上去找我的好友贺军——他目前住在美国的波士顿，告诉他这个消息，我们一致认为，毛主席不可能活到150岁，因为这违反科学常识。

从这时起，我在心里悄悄地对毛泽东有了疑问。我知道在中国，一切都凭他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即使刘少奇，虽然《历史决议》对他评价极高，虽然在文革前到处都能看到毛、刘并列的领袖标准像，虽然刘少奇夫妇访问东南亚是何等的热烈和风光，但是如果毛泽东不喜欢，刘少奇马上就被打倒。我又看到自己身边发生的一些事，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小巷的破矮平房里，住着与我同校但不同班的一对姐弟和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妈妈是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在街道煤球厂砸煤基（蜂窝煤）。因为不能忍受歧视和侮辱，这位母亲竟失去控制，将毛主席的画像撕碎并呼喊“反动口号”，结果在1970年南京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枪毙。召开公判大会那一天，我的中学将所有学生拉到路边，观看行刑车队通过，美其名曰“接受教育”，这姐弟两人也被安排在人群中，亲眼目睹他们的母亲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车队通过后，学校革委会副主任要求全校各班立即分组讨论，于是所有同学都表态拥护“镇压反革命”——所有这一切都让我对毛产生了看法。我知道这些看法绝不能和任何人讲，甚至不能和自己的父母讲，只能深埋在心中。

在那令人窒息的岁月里，没有希望，没有绿色，除了从小在一起长大的贺军，差不多也没有任何可以与之交心的朋友（即使我们之间的谈话也小心翼翼，绝不敢议论毛泽东），但是，我的心中仍存有一线微弱的光。我家附近有南京某中学留守处，这个中学已被勒令搬至农村，所有被封存的图书都堆放在留守处的大仓库里，由一姜姓老先生看管（老人是山东人，年青时被国民党拉去当兵，被解放军俘虏后成为“解放”战士）。至今我仍感激这位老先生，是他允许我每周进一次仓库借一旅行袋的书，下周依时交换。正是在那里，我翻检到1958年的《文艺报》的《再批判》专辑，因而我第一次读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在那几年，我从这个仓库借去大量的中外文学和历史书籍，至今还记得，孟德斯鸠的《一个波斯人的信札》、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惠特曼的《草叶集》、叶圣陶的《倪焕之》、老舍的《骆驼祥子》，就是在那个时候读的。1971年后南京图书馆局部恢复开放，我又在每个休息日去那里读《鲁迅全集》，将包括鲁迅译著在内的旧版《鲁迅全集》全部通读了一遍。正是这些作品支撑起我的人文主义的信念。

70年代中期，国内的政治局势更加险恶，我的一位熟人的弟弟，因愤恨江青的专横，在1975年从其位于南京市卫巷家中的阁楼上跳下自杀身亡。我家也每天受到居民小组老太太的监视，只要家里来一外人，她就站在门口探头探脑，东张西望。197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与好友贺军坐在长江路人行道的路边，我背诵了鲁迅的话：“地下火在运行，岩浆在奔突……”（1995年8月底，我与贺军在纽约第五大道的街心花园坐了半天，我们共同回忆起往昔岁月，我们都谈到1976年夏在长江路边的那次谈话）。



在文革期间，我读了许多毛的内部讲话和有关“两条路线斗争”的资料，这些资料真真假假，其中不少充斥着大量的歪曲和谎言，然而它们还是激起了我强烈的兴趣。结合文革中所发生、暴露出的一切，以及自己的生活感受，我愈来愈有一种想探究中共革命历史的愿望，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了延安整风运动——这虽然是距那时以前几十年的往事，但我还是隐约感到，眼下一切似乎都与它有联系。在大字报和各种文革材料中，我难道不是经常读到毛和其他“中央首长”的讲话吗：什么“×××最坏，在宁都会议上，他想枪毙我”，“刘少奇在抗战期间勾结王明反对毛主席的独立自主方针”，什么“×××在延安审干中查是自首分子，因此对他控制使用”，还有“王明化名马马维奇在苏联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等等。

在那些年里，我虽然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却不知填了多少表格，从小学、中学到工作单位，每一次都要在“政治面貌”、“社会关系”栏内填写老一套的内容。看看周围的人，大家也一样要填表。我工作单位的人事干事是从老解放区来的，她说，这是党的审干的传统，是从延安整风开始执行和推广的，那么延安整风运动又是怎么回事呢。带着这些疑问，1978年秋，我以历史系作为自己的第一选择，考入了南京大学历史系。

1979年后的中国大学教育开始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我经历了那几年由思想解放运动而带来的震撼并引发了更多的思考。在课堂上，我再次听老师讲延安整风运动，我也陆续看到一些谈论“抢救”运动的材料，然而所有这些都在维持一个基本解释：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1979年我还读到周扬那篇有名的文章《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周扬将延安整风与五四运动、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相提并论，谓之为“思想解放运动”。在大学读书的那几年，我知道，虽然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已被批评，但毛的极左的一套仍根深蒂固，它已渗透到当代人思想意识的深处，成为某种习惯性思维，表现在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就是官学甚行，为圣人避讳，或研究为某种权威著述作注脚，几乎成为一种流行的风尚。当然我十分理解前辈学者的矛盾和苦衷，他们或被过去的极左搞怕了，或是因为年轻时受到的《联共党史》、《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思想训练太深，以至根本无法跳出官学的窠臼。

然而，我难以忘怀过去岁月留下的精神记忆，刘知几云，治史要具史才、史学、史识，其最重要之处就是秉笔直书，“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我难以忘记1979年在课堂上听老师讲授司马迁《报任安书》时内心所引起的激动，我也时时忆及范文澜先生对史学后进的教诲：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所有这些都促使我跳出僵硬教条的束缚，努力发挥出自己的主体意识，让思想真正自由起来。从那时起，我萌生一个愿望，将来要写一本真实反映延安整风的史书，为此我开始搜集资料。

由于延安整风在主流话语中是一个特殊的符号，有关史料的开放一直非常有限，这给研究者带来极大的困难，但在80年代以后，中国也陆续披露了某些与延安整风运动相关的历史资料，除了少量档案、文件集外，也出版了不少回忆资料，这给研究者既带来了便利，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分析、辨别、解释这些材料。应该说，我在中国大陆长期的生活体验以及我对有关史料的广泛涉猎，加强了我读资料的敏感性，我逐渐能够判断在那些话语后面所隐蔽的东西。

经过对多年搜集、积累资料的反复研究和体会，我头脑中的延安整风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我开始发现散乱在各种零碎资料之间的有机联系。1991年8月中旬我开始动笔，到1992年下半年，我已完成初稿的三分之二。

从1992年下半年始，我的写作速度慢了下来，一则日常教学工作十分繁重

，牵扯了我不少精力；二则我需要更广泛地搜集、阅读各种资料。

1995年夏——1996年秋，我有机会去设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作访问学者，我在美国的研究题目与延安整风无关，但我仍利用在华盛顿的机会，在国会图书馆工作了一个月。但是很遗憾，国会图书馆中文部虽然收藏十分丰富，但是几乎找不到有关延安整风的材料。1996年10月我返国后，又重新开始写作，到了1998年夏，全书已经完成。我又用半年时间对书稿作了3次修改补充，于1998年底，全书杀青。1999年初交稿后，在编辑校对阶段，我接触到若干新材料，对书中的个别内容再次做了充实，于1999年春夏之交，全书最后定稿。

我写这本书在思想上一直以求真求实为依归，在写作过程中，始终遵循据事言理的治学方法。我以为，重要的是，首先应将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叙述清楚，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数十年意识形态的解释学早将当年那场事件搞得云环雾绕，面目不清。为此我作了大量的工作，对各种重要和非重要的资料进行点滴归拢，爬梳鉴别，再对之反复研究体会，使之融汇贯通。这方面的工作用去我最多的时间和精力。

我不反对对延安整风这一重大现象进行严谨的理论分析，且认为，这个工作极为重要，但是我又担心过度解释而妨碍读者自己的判断。陈寅恪先生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滴水观沧海”，因此在本书中，我从实证研究的角度，以分析性论述的方式展开，这也与我个人比较重视历史的个案研究有关。

在写作此书的7年里，我一直怀有深深的遗憾，这就是，我无法得到更重要的原始资料。众所周知，有关延安整风期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社部、中组部的档案文献，除少量披露外，绝大部份迄今仍未公开。1992年，我看到一位负责人在中央档案馆的讲话，他说，鉴于苏东巨变的深刻的历史教训，应该加强对档案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他指出，中共档案资料的保管，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我可以理解这位负责人的观点，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却为不能阅读利用这些珍贵史料而感到无穷的遗憾。

由于这是一本站在民间立场的个人写作，十多年来我从自己不多的工资里挤出钱购买了大量的书籍资料，我从没有以此选题申请国家、省级或大学的任何社科研究项目的资助，我知道，即使申请也不会成功。所以我的另一个遗憾是，我无法对一些当年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人士进行口述采访，如果我做了这样的工作，一定会对本书的内容有所充实。

最后，我的遗憾是我应该去莫斯科搜寻有关资料。90年代后，莫斯科开禁历史档案，涉及40年代苏共与中共交往的文献记录也已开放。中国历史学会的沈志华博士近年来为搜集这些史料作了大量工作，他并已将其中某些材料转送北京研究者（沈博士告诉我，苏共与中共在延安整风期间交往的史料很少），因沈博士去美国，一时联系不上，这也使我深感遗憾。

伏案几载，每天神游于当年的历史景像之中，自然会对延安整风运动及其相关的史事与人物产生种种体会，这方面的体会与感受的绝大部份已化为书中的叙述，但是还有几点需在此予以说明。：

1、予生也晚也，未能躬逢中共草创革命的年代。吾细读历史，站在20世纪全局观二十年代后中共革命之风起云涌，心中自对中共革命抱持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将其看成是20世纪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认为在历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

2、从中共革命夺权、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角度观之，延安整风运动对于中共革命成功助力巨大，但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某些概念、范式以后又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若干消极作用，极左思想、权谋政治汇溪成流，终至酿成建国后思想领域一系列过左的政治运动直至文革惨祸，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所幸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已逐步走出过去那种怀疑一切，无情斗争的极左道路，但旧习惯思维的清理仍需长期努力。吾期盼旧时极左的“以我划线”、权谋政治永不再来，国家从此能步入民主、法治的轨道，如此，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3、本书涵盖面颇宽，涉及中国现代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对于本书所论及的所有人物，我只将其看成历史人物，不存任何既定的好恶偏见，主观上力求客观公允，“不虚美，不隐恶”。当然任何研究都不可能完全排除作者的价值关怀，陈衡哲先生曾说过，“若仅缕述某人某国于某年征服某地……那有什么意思”，说的也是研究者的价值关怀问题，只是这种价值关怀不应妨害到叙述的中立和客观。如果说本书叙述中有什么价值倾向的话，那就是我至今还深以为然的五四以后的新价值：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

□ 1999年6月于南京大学

∞ ∞ ∞ ∞ ∞ ∞ ∞ ∞ ∞ ∞

我从“文化大革命”得到了什么

• 王力雄 •

我父死于文革（文革后的术语称为“迫害致死”），那年我十五岁。后来人们所历数的文革之苦，大部份我都亲身尝受，因此我从文革得到了什么，肯定不是当年的造反派、军宣队者可能仍在怀念的既得利益。我之所以写这个题目，一是觉得不差在已有的众多控诉之上，再加一份我个人的抱怨；还有一点，是因为我的确有这样的感觉——我从文革所得，抵得过我在文革所失。

我常常想，如果没有文革，我现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无法断言和具体描绘，不过肯定跟现在很不同。文革前我上小学，曾在大街上尾随着求一老妇让我帮她提包袱，因为老师教导我们要象雷锋那样扶老携幼。当时我不理解老太太为何把包袱换到远离我的那只手上，而且对我想做“好人好事”的愿望百倍警惕。文革前我曾激动万分地为中国爆炸了原子弹欢呼雀跃，因为原子弹可以成百万地杀死“美帝”和“苏修”。那时我还秉承老师的意志在班里开展“思想整风”（我是班干部），因为有女同学议论哪个男生长得好看。我们那时在解放军士兵的亲自指导下每天苦练“杀敌本领”，却曾被几个“小野孩”（当时对干部子女寄宿学校大墙外的孩子统做此称）打得上百人不敢还手……总之，那时我是父母的好宝贝，老师的好学生，毛主席的好孩子，还是“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十三。面对现在十三岁的孩子，我无法想象那时的我怎么会去走南闯北“大串联”，仅剩自己一人时还继续在全国转了一个多月。记得第一次“大辩论”我败下了阵，原因是一个内蒙红卫兵宣称要撕下我的“资产阶级遮羞布”，我不懂“遮羞布”为何物而无言以对。第一次撒传单是在上海街头，当我把昼夜刻制出来的传单按照预想多次的姿势抛向空中，却因为传单揣得卷了角如一块砖头落地，人群中窜出另一红卫兵一把抢去撒了个满天开花——他那潇洒雄姿至今犹在我眼前。不久，我己能在叮当作响的有轨电车上把大团传单乘风撒向街头人群，感觉自己象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有时还会在“大世界”楼顶一张一张向下扔，逗下面的人们争抢取乐。

文革使我领着弟弟独立生活，在父母皆被关押的岁月，学会以偷填充饥腹，有时连一块取暖的煤都得靠偷才能得到。我们学会了用自制铁钩“钓”垃圾箱旁出没

的野狗，吃掉它们本来就很瘦的身体，再让它们身上的跳蚤吃我们。我跟很多被称为“流氓”的人打交道，也从自己被冠上这样的称号而改变过去对“流氓”的看法。我那时莫名其妙地喜欢一本黄山风景画册，并且策划过一次最终未成行的黄山之游——计划在进山时砍倒“迎客松”，出山时砍倒“送客松”，再把那张最美的“石猴观海”照片中的石猴掀到山底下去。我还养了一条蛇，经常把它系在脖子上当领带。有时用黄磷在脸上抹出会在黑暗中发光的条纹斑点，夜晚出门游荡。

但是那时我写诗，我读完了父母所有没被造反派抄走的藏书。在寂静深夜用自制的天文望远镜凝望星空，从月球环型山或土星光环中产生跨越时空的遐想。我画油画，拉小提琴，不经任何训练，直接“创作”，只是想画出心里那在宇宙深处璀璨闪耀的天堂，听到内心那让我坐立不安的飘渺在天际的音籁，表达那让人如醉如痴的诗意。我不否认那是一个文化绝对荒芜的年代，可那时对美的敏感、渴望和吸收也是前所未有。似乎所有审美神经都血淋淋地剥离出来，任何一点轻微的触动都能引起颤栗。当我们全家被弄到一个没有电的村庄，为了能够听家里劫后余生的几张“老贝”（贝多芬）和“老柴”（柴科夫斯基）的唱片，我那巧手的弟弟把半导体收音机改成电唱机的拾音器，而老式唱机每分钟三十三又二分之一的转速，是靠我们用手指头驱动！我和我弟轮班，一人转一人听，最后几乎练到准确的程度，竟能在转动中产生是自己指挥莫斯科交响乐团的感觉！

那时盼望和苏联开战，理由之一是可以到莫斯科去抢唱片——当年能听到的好唱片几乎都来自苏联。我认识的同代人中，一多半都认为自己将来会是拿破仑或列宁，至少也能当国家总理。为了胜任未来将要充当的角色，我们生吞活剥地读一切可能有用的书，通宵达旦地讨论世界革命、国际政治和未来战争。我那时跟毛泽东的作息时间差不多，早上睡觉，傍晚起床，夜晚活动。夜晚适合偷东西，适合看星空，适合在旷野拉提琴，适合在北风呼啸声中围着火炉讲故事。那时没有歌星影星，少男少女们的话题是普希金、托尔斯泰、雨果、杰克·伦敦……还有基督山伯爵和梅花党。

我那时住在东北长春，口袋里有二元钱就敢上北京，从不买票。下乡以后，更是把全国火车都视为理所当然免费。我认识一群插队到长白山的知青，他们没有用国家发的安家费盖房子，而是买了猎枪、鱼网、小船、冰车和雪盲眼镜，养了二十多条狗加上一百多只鸽子。那个“集体户”是当时我认为全世界最好玩的地方。那里的皑皑白雪和寂静山林让我永生难忘。

后来我一个人在东北丘陵地带的一个小村庄生活了两年。我成了生产队的干部，学会了所有农活。我那时开始渴望“改造世界观”，摆脱渺小的个人不幸，与过去的颓废彻底决裂。我体会到了宗教的境界。记得一次凝视毛泽东的画像，竟能在入定后流水般地渗入像中，与毛泽东溶在一起，化作圣体之内的一个分子。那一刻大彻大悟的感觉使我内心充满光明和感动。为了对“皈依”的坚定进行证实，追肥时哪怕清楚地看见没沤好的新鲜人粪，我也一定要坚定地抓在手中，象抓住了革命，捏得人粪从指缝溢出一——连贫下中农都不会那样干啊。

插队四年的时光，我吃了不少贫下中农的饭，听他们讲祖祖辈辈的故事，和他们的女儿眉来眼去，品尝他们平凡生活中的甜酸苦辣。“中国”两个字的概念，从此在我心中展现的首先是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没有那一段时光，也许我现在——甚至终生——也不能真正了解中国。

“文化大革命”的最后几年我上了“工农兵大学”。那是中国教育史上倍受奚落的一段，对我却恰到好处，使我至今仍庆幸生逢其时遇上了“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没有作业，从不考试。我学的专业是汽车设计，但是我可以自豪地宣称上了一个“政治体育汽车系”。每天有三分之一时间泡在运动场。还有三分之一时间是

政治学习，那是躲不掉的，却也不象现在想得那样可怕。在表面的千篇一律和陈词滥调之下，反叛者的灵魂一样可以存在，百年不断的“中国向何处去”的探索同样可以进行。我那时读了许多“马列主义”著作，不是装样子，是真正如饥似渴。我用那些书批判现实，又从现实对那些书产生质疑。“工农兵大学”特有的“开门办学”使我的大学生活三分之一是在各地的工矿企业，旅行于大江南北，从而能一直清晰地感受时代脉搏。我感谢那些时光。至今我最重要的思想，仍是那时植下的根基。

与我的同龄人聚在一起，“文化大革命”总是在回忆中占有最多的位置。文革之前和之后，往往几句话就能带过，红卫兵年代和上山下乡的岁月却似乎总也谈不完。也许这不能说明什么，每一代人都珍惜自己的青春，五十年代的青年不也照样赞美其“青春万岁”，然而“文化大革命”毕竟隆起了一道分水岭。“文化大革命”的青春是无所依靠的，是从原本紧密结合为一体的社会逐步疏离的过程，是在最不自由中获得充份自由的过程，是在人格扭曲中得到延伸和舒展的过程，是暗无天日中确确实实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文化大革命”使我认识了太多的不义、背叛和邪恶，使我从此冷漠，从此不再会哭。“文化大革命”让我目睹太多的死亡，心也变得残忍。“文化大革命”展现的起落沉浮和福祸相依让人从此宠辱不惊。

从“文化大革命”宣称的要让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而言，“文化大革命”应该说实现了它的目标。既然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会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也就清楚地说明了那“革命”对我的作用。然而灵魂的革命并非按照既定程序，革命的结果也许会与初始的“设计”背道而驰。以“混沌”观点来看，当变量多到一定程度，系统就会在高度复杂性中产生不可预测的走向，从而脱离主观控制，使结果与既定目标偏离。几年前轰动一时的美国电影《侏罗纪公园》正是演了这样一个故事——资本家的金钱与科学家的智慧结合，利用遗传工程复制出了绝种上千万年的恐龙，并且在一座封闭的海岛上建起名为“侏罗纪公园”的恐龙观光地。一切可能出现的问题都在考虑之中，管理的“科学”和严密无可挑剔。然而恐龙最终还是在一连串“意外”事故中逃出了人的控制，并且对制造出它们的人发动了残酷攻击。“科学”在那时则变得完全无能为力。

相对于“侏罗纪公园”，囊括了数亿人的“文化大革命”无论从变量数目还是还是从复杂性上都超出千万倍，结果的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就更成为必然。在看那部《侏罗纪公园》时，我想到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只可能是那只被扔进栅栏里喂恐龙的羊。“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是一位有超凡想象力的诗人，他想创造更为刺激、更有活力的奇观——把羊变成恐龙！

他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也自信能把创造的恐龙关在笼子里。

记得七六年九月的那个下午，我和女友正躲在我们的小天地。当我听见初秋滚滚天雷中传来远处的哀乐，立刻想到就是他——那位始作俑者撒手人寰。那时我眼前熠熠生辉，女友也显得格外漂亮。我迫不及待地起身，脑海翻舞纷纭迷乱的五彩。

第一个念头就是出去！

□ 原载《东方》杂志 1996年

---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国） <cnd-cm@cnd.org>

---